

無孔不入的媒體現實： 直接和間接經驗對香港與廣州受眾犯罪觀念的影響*

郭中實、祝建華、陳懷林、俞旭、黃煜*

《摘要》

本研究通過整合涵化理論與非個人影響理論探討了不同的信息源在影響個人對犯罪的觀念的形成及變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作者于1997年和1999年在香港和廣州收集了官方犯罪統計數據，報紙的犯罪報導並對兩地居民進行了抽樣調查。分析顯示，儘管兩地的實際犯罪率均有下降，但是媒體報導的篇幅與煽情程度卻大幅增加，而居民對犯罪的看法更加接近媒體的描述。兩地居民均普遍認為另一社區更危險，這與我們提出的「第三地效應」具有相符之處。

關鍵詞：涵化效果、非個人影響、犯罪報導、犯罪觀念、第三地效應、媒體效果

投稿日期：2001年5月11日；通過日期：2002年1月17日。

* 本研究項目是由香港大學委員會（CITYU1018/97H）及香港浸會大學（FRG/96-97/II-26）研究經費資助。作者對兩位提出寶貴意見的匿名評審人表示感謝。

**作者郭中實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guo@hkbu.edu.hk；祝建華為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系教授，Email: enjhzhu@cityu.edu.hk；陳懷林為澳門大學社會人文學院助理教授，Email: huailinchen@yahoo.com；俞旭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s32081@hkbu.edu.hk；黃煜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s03033@hkbu.edu.hk。

研究人們建構社會現實的過程，就是一個了解個人透過總結直接及間接經驗而形成自身看法的整個推斷過程。其中，直接經驗指的是人與現實的感官接觸，而間接經驗則源自非正式的人際交流及大眾傳媒（Tyler, 1980）。人們能夠有意或無意地將兩種經驗融會貫通，形成對世界的看法、觀念及意見，進而作出判斷和決定並採取行動。

學者們在研究人們對現實的看法時往往超越了概念本身，而深入到造成現實觀念的各種社會力量。這樣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個人對現實的認識過程匯聚起來，就成為公眾輿論及採取集體行動的重要基礎（Glynn, Ostman, & McDonald, 1995）。其二，學者們更為關注的是，人們賴以認識世界的信息生產者在此過程中所起的操控作用。無疑，大眾傳媒在這方面的潛在影響力不容忽視。媒體傳遞的信息可以誤導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此事令人憂心忡忡。這種擔憂乃是基於兩個重要的前提：一、人們在形成對現實的看法時，嚴重依賴象徵性的描述；二、此類描述多半維護社會制度中的既得利益，故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偏見（Peters, 1995）。

在這一大思維框架下，本研究分析了人們對社會的看法及其形成過程，重點在了解這些看法的內部架構，以及大眾傳媒和其它形式的社會經驗對此的不同影響。我們的研究對象將人們的現實觀念縮小到對犯罪的看法及其形成。我們的目的是為兩個主要研究問題尋找答案：一、人們對犯罪的看法主要包含什麼？二、媒體信息和直接經驗是如何影響人們對犯罪的看法的？

在認識事物方面，通過人際交往形式獲知的信息與從非人際交往形式中得到的信息各有特點。由於直接體驗受限於人的生活空間，所以通過這一渠道得到的信息也是極為有限的（Tyler, 1984）。人與人之間的交談這種非正式的傳播，儘管長短、內容、涉及面各異，但同樣也離不開個人交往的小範圍（McLeod, Scheufele, Moy, Horowitz, Holbert, Zhang, & Hicks, 1998）。相形之下，大眾傳媒傳播的內容，則是人們了解自身生活環境之外的社會的最系統、最持久且最穩定的信息來源（Mutz, 1998）。

儘管我們對獲取信息的各種形式有所了解，但直接經驗、交際網絡、大眾傳媒信息與人們對現實的看法之間的關聯仍令人困惑。例如，直接經驗雖然具有局限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其對社會觀念的影響微不足道。個人的親身體驗可以用來驗證來自間接渠道的信息，從而對維持或改變人們對社會的看法舉足輕重。另一方面，人們可以通過交談而借鑒他人的經驗，這在人們形成對某些罕有的但後果嚴重的事情（如成為犯罪的受害者）的看法時，大有裨益。

本研究整合了兩種理論方法和它們的前提，將不同信息來源對不同的觀念的影響加以比較。為了便利操作，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將傳媒塑造象徵性現實的研究對象簡化為一組同犯罪有關的概念，包括對犯罪出現的可能性的估計和對於「卑鄙的世界綜合症」（mean world syndrome）的測量指標。從概念和實證分析來看，這些觀念和人們觀看電視的時間總量的聯繫十分密切，超過了同現實社會中個人經驗的聯繩。由 Tyler (1980) 提出，並由 Mutz (1998) 進一步發展的「非個人影響」（impersonal impact）模式同樣研究人們對犯罪的看法，但卻是著重對比不同類型經驗的不同效果。其核心是大眾傳媒對涉及社會層面的觀念的影響大於對個人層面的觀念的影響。

壹、理論概念探討

有關觀念及看法的各種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假定，即個人會留意觀察他們身處的社會環境並形成某種觀念，在此基礎上作出判斷和決定。其中推動觀念產生的動力是期望得出因果關係，從而將新輸入的信息和現存的知識總結歸納（Sherif, 1967）。正是這種尋根問底式地理解世界的需要，將人類的觀念形成過程變為一個推論和解釋的過程，由此產生所謂的「幼稚的心理學家」（Heider, 1958）或「緘默的理論家」（Patterson, 1993）。

社會現實傳遞至個人的過程混合了感官的感知、人際傳播和接觸大眾傳媒。這種混合常常是不徹底的，所以整合和理解至關重要。不過整合和理解的過程可能導致觀念的錯誤和理解的偏差。當評估的對象處於個人的親身接觸範圍之外，問題就可能特別嚴重。「距離」這個概念於是就浮現出來。被評估的對象越是「鞭長莫及」，就越依賴於間接信息渠道獲取信息。這種直觀的規律適用於觀念的所有領域。本研究所涉及的是「卑鄙的世界」（mean world）和與犯罪相關的觀念及看法，並且探究在其形成的過程中如何受到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影響。總之，對犯罪觀念形成的前提條件的研究，大概都遵循本文所提的兩個理論框架：「涵化理論」與「非個人影響模式」。

貳、涵化理論的解釋

涵化理論的研究發現傳媒現實和受眾的「領悟現實」（perceived reality）之間存在顯著的關連。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被系統地扭曲了的、代表主流價值觀的信

息滲透於傳媒，尤其是電視的節目之中。因此，傳媒所描述的被扭曲的世界和電視饕餮們領悟的社會現實高度吻合（Gerbner, Gross, Morgan, & Signorielli, 1980; Potter, 1994）。該理論強調傳媒扮演的社會控制代理人的角色，而受眾的錯誤觀念則源自於傳媒。這些觀念之所以被稱為是錯誤的，是因為它們偏離了客觀現實。電視和其它傳媒展現了一種令人驚恐的社會關係，在實際生活中常見的角色和規範幾乎蕩然無存，而電視沉迷者心目中的社會現實因而深受影響（Morgan & Shanahan, 1996）。本地的一些有關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參看 Chen, 1991; Chu, 1993）。

根據涵化理論，暴力形象在黃金時段電視節目中有增無減，使熱衷電視的觀眾患上「卑鄙的世界綜合症」，其症狀是不信任陌生人，對社會環境過度恐懼，以及精神頽廢。雖然該理論並沒有直接比較傳媒和其他形式的間接體驗對人們觀念形成的影響，但其中的「主流化」（mainstreaming）概念強調了電視能夠使具有不同社會背景的觀眾在觀念上趨向一致，其含意是傳媒具有取代多樣化的社會因素對觀念的影響能力（Gerbner, Gross, Morgan, & Signorielli, 1994）。在涵化理論中，只有當個人直接經驗和傳媒真實發生「共振」時，個人經驗才具有催化劑或是「加倍劑量」的效果（Gerbner *et al.*, 1980）。

然而，不少其它研究發現，當直接經驗與傳媒經驗格格不入時，受眾會以他們的直接經驗作為檢驗真實的標準，從而拒絕接受銀幕上的世界。Doob & MacDonald (1979) 發現，同樣長時間收看電視，生活在低犯罪率社區的觀眾恐懼感較低，而生活在高犯罪率社區的觀眾恐懼感較高。他們由此得出結論「收看電視本身不一定是人們擔憂成為犯罪受害者的直接原因」(177)，因為社區的犯罪率會從中影響兩者的關係。無獨有偶，涵化理論的研究者和批評者也都已經認識到，不僅要搜尋傳媒內容對社會現實系統化的扭曲，還要探索直接和間接經驗對社會真實觀念的不同影響。

參、非個人影響模式

在對現實觀念的分析方面，非個人影響模式和涵化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將現實觀念分成不同的類型，並且認為其根源也不盡相同。Tyler (1980) 在有關犯罪觀念形成的研究中檢驗了間接經驗和直接經驗的影響及其發生過程，他的發現主要有兩點。首先，在人們心目中有關犯罪侵害的觀念被清晰地分隔成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亦即人們能夠並且願意將個人遭受犯罪侵害的可能性與社會層面的犯罪率

加以區別。其次，個人層面的觀念和他或她的直接經驗相關，而社會層面的觀念則更容易受到傳媒信息的影響。而其他形式的間接的、但並非來自傳媒的經驗、人際交流等對兩個層面的觀念都可能發生影響（參看 Tyler, 1984; Tyler & Cook, 1984）。

Mutz (1998) 在研究個人層面和集合層面的判斷差距時，也發現了兩個層面的區別。按照這個思路，大眾傳媒的影響被認為主要是針對個人經驗之外的有關外部社會的觀念。Mutz 認為在媒體的引領下，人們交流的對象不再是表明身份的、具體的個人，而是一個抽象的社區。個人直接經驗和人際交流的作用難以逾越地域的局限，大眾傳媒的非個人化的影響則不受此限。因此，當人們在形成有關社區的印象、觀念和判斷，而這些印象、觀念和判斷又在他們的直接經驗中「無據可依」時，直接經驗的重要性就相對降低了。

有關非個人影響模式的研究證據顯示，在理論概念上，人們的觀念依據其所評估的目標的接近程度，分隔成不同的層面。大眾傳媒對那些在個人直接接觸的範圍之外的觀念，有較強大的影響。這就使得上述兩種理論模式可能在某處交匯。將非個人影響模式用於涵化理論分析，就能得出，當觀念涉及的範圍位於社會層面（如估計地區的犯罪率），傳媒的涵化效果最可能發生。相反，處於個人層面的觀念，評估或行為就不容易受到傳媒信息的影響，它們通常可以以個人經驗和人際交流來解釋。

我們自己的研究也為上述觀點提供了證據 (Chen & Guo, 1995)。當以非個人影響模式的取向來檢驗涵化理論時，我們發現，電視收視的時間總量僅僅和社會層面的觀念相關，而和個人層面的觀念（如受犯罪侵害的可能）無關。正如非個人影響模式所預示的，個人層面的觀念更可能源自直接經驗。

綜上所述，犯罪觀念可以說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在社會層面，是一組有關「卑鄙的世界綜合症」和犯罪率估計的認知測量指標；個人層面則是一些測量恐懼侵害的情感和行為的指標。儘管大眾傳媒被認為是對犯罪觀念影響力最大的信息渠道 (Graber, 1980, Einsiedel, Salomone, & Schneider, 1984, Jeffres, Atkin & Neudendorf, 1998)，但人際傳播和個人直接經驗對傳媒塑造的形象也有強化或稀釋的作用。

肆、研究地點和理論應用

我們選擇了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廣州作為研究的地點，因為從它們的一些特點中

可以引伸出有關觀念及其原因的一些有趣的理論假設。這兩座相隔大約 160 公里的城市人口大致相等，使用同樣的方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其他文化背景也十分相似。

不過，兩座城市也存在某些不同之處，使得它們尤其適宜於本研究課題。香港的居民（大部分祖籍在廣州或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可以經常到廣東省旅行，他們對廣州有著豐富的第一手體驗。不過，香港居民一般很少使用大陸傳媒，甚至連偶然接觸的也不多。我們的研究顯示，95% 的香港居民表示去過大陸。根據香港政府的官方統計，平均每天過境進入廣東的香港人超過八萬，而假期的過境人數更是數以十萬計。然而，直接的個人體驗顯然並沒有激起香港人接觸大陸傳媒的興趣。甚至由中國政府支持的香港左派傳媒也受眾寥寥（Guo, 2000）。

在邊界的另一側，由於大陸政府的限制政策，大多數廣州市民未曾踏足香港。不過，他們長年四季地收看香港的電視節目，以彌補不能親身訪問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遺憾。廣東省是整個中國大陸唯一被中央政府特許可以收視香港四個商業頻道的行政區域。

真正使穗港兩地涇渭分明的是各執一端的政治和傳媒環境。集權控制下，大陸所有的傳媒都聽命於意識形態的「緊箍咒」；而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的香港，市場法則主導著百家爭鳴的傳媒環境。其結果是，大陸傳媒人員渲染罪案的衝動遭到官方新聞審查制度的約束，當案情涉及暴力或上層人士時，這種控制尤為突出。這樣做的目的是創造一個社會穩定的假象，使國內和海外的受眾忽略政府中普遍貪污的現象。近年來的傳媒市場化並沒有顯著舒緩政府對傳媒內容的種種限制。

截然不同的是，香港傳媒歷來盛行煽情主義的傳統，近年來在激烈市場競爭的刺激下，更是變本加厲。合計市場佔有率高達 75% 的頭兩家中文報紙《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性」風血雨充斥版面，無所不用其極。有趣的是，正當傳媒對暴力犯罪的渲染登峰造極之時，同期香港的犯罪率卻穩步下降。這種存在於「半客觀現實」、「傳媒象徵性現實」和受眾對犯罪侵害的實際生活體驗之間的差異，為我們測試人們的觀念和前提條件之間的理論聯繫，提供了基本的可能。在這個「自然狀態實驗」中，廣州和香港可以被各自視為對方的控制組，形成一個二乘二的實驗模式。模式中兩種有關犯罪的觀念（本社區及與己相隔的社區），和兩個不同地點（香港和廣州）。我們還將加上時間，作為第三因素。對比不同時間的結果使我們能夠觀察變化情況，以更充足的證據來權衡不同的信息來源對人們的總體觀念的影響。

伍、研究方法

本研究數據來自三個方面：從廣州和香港的官方機構獲取有關犯罪的統計資料；在兩個城市對當地的報紙作內容分析；在 1997 年和 1999 年的三月在兩地同時進行縱貫受眾調查（longitudinal survey）。

一、官方統計資料

香港政府新聞處給本研究提供了一般和特別的犯罪紀錄數據，其中包括 1996 年到 1998 年和本研究前一年警察局接到的案件總數，以及分類案件紀錄（如搶劫、謀殺等）。廣州的數據由廣州高等法院提供，不過略有不同。廣州的數據紀錄的不是報案的數量，而是 1996 到 1998 年間經由法庭審訊的案件數。雖然廣州的數據與香港的數據不可比，但是，卻可以幫助揭示出普通和特殊犯罪率的升降趨勢，這樣也就可以向遊客和居民提示出生活環境的安全程度。

對於粵港兩地來說，我們將政府提供的數據與被訪者的估計數進行了比較，以觀察數據的一致性和偏差。

二、抽樣調查

香港 在香港我們採用的是電話訪問。我們專門設計了一個計算機隨機抽樣程序（Random Digit Dialing）。由於兩年的抽樣程序一樣，在此我們只對 1997 年的抽樣進行描述。我們隨機抽出了 8,000 個電話號碼，然後，請選修研究方法課程的學生進行電話訪問。對於每一個符合條件的家庭（既非公司電話、傳真、空號、五次撥號無人等情況），再利用最近生日法隨機選出一個 18 歲到 75 歲的成年人。通過這個方式我們得到了 51.4% 的成功率（完成數/完成數 + 拒絕人數）。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來自 572 個最後隨機抽出的被訪者。每一位被訪者都被問到有關「卑鄙的世界」和犯罪率觀念的問題。

通過對樣本（sample）和母體（population）數據中性別和年齡聯合分佈的對比，我們對數據質量進行了檢察。結果是，樣本和母體在性別一年齡組上的平均偏差為 1.5%。為了減少偏差的影響，我們根據性別和年齡的共同分佈，對樣本進行了加權處理。

廣州 在廣州我們採取的是比例隨機抽樣面訪（Proportional Probability Sampling）。通過隨機抽樣，我們得到了兩個樣本，1997 年為 969 人，1999 年為

1,788 人。基於同樣的原因，這裡我們只對 1997 年的抽樣調查加以說明。最初的樣本是通過多元非均等隨機抽樣得來的。首先，我們在廣州的五個區內選出五十四個住宅小區。然後在根據每個內總人口的多少來決定住宅小區的數量。然後，再根據派出所的登記，從每一個選出的住宅小區內系統抽出二十個家庭。最後，再根據 Kish 雜數表格從每一個被選中的家庭中抽出一個年齡在 18 歲到 75 歲之間的成年人。在香港進行抽樣調查的時候，我們委托了廣州達門市場研究公司在廣州幫助我們進行面訪。廣州面訪的成功率是 70%（完成數/完成數+拒絕數）。廣州的樣本也像香港的樣本一樣進行了加權處理。

三、內容分析

為了擴大數據的代表性，我們在香港和廣州分別選擇了三家報紙。在廣州，我們選擇了市屬黨的機關報《廣州日報》、省屬黨的機關報《南方日報》、和大眾化報紙《羊城晚報》。總體來說，這三份報紙的讀者包括了廣州市報紙讀者總數的近 80%。在香港，我們分析了三份報紙，《東方日報》（這是一份本地發行量最高，而且以刊登聳人聽聞的內容而被人側目的報紙）、《明報》（這份報紙基於社會中上階層讀者的編輯方針而吸引了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南華早報》（這份報紙主要發行對象是英語和中英文雙語讀者）。我們對抽樣調查前三個月，也就是兩地報紙 1997 年和 1999 年 1 月 1 日到 3 月 31 日之間的所有報紙進行了內容分析，我們同時培訓了研究生為我們進行數據編碼。本研究規定的基本分析單位為報導，這樣小樣本就由編碼員進行編碼，然後，再用 Cronbach's alpha (Cronbach, 1951) 的方式對編碼員之間的相互信度進行測試。每一個報導的編碼分為，出現犯罪 ($\alpha=0.95$)，犯罪地點 ($\alpha=0.90$)，描寫是否詳細 ($\alpha=0.69$)，標題是否戲劇化 ($\alpha=0.69$)，及是否有圖片 ($\alpha=0.88$)。由於我們在抽樣調查問卷中要求被訪者估計不同類型的犯罪的發案率，所以我們從媒體內容中抽出八個不同類型的犯罪與抽樣調查的結果進行了比較。

四、測量

根據分析的需要，本研究中的變項分成三個主要部分：觀念變項；受眾對於另一城市的直接和間接經驗；受眾的社會和人口資料。本文所涉及的問題都在兩地進行的兩次調查中，以完全同樣的形式出現在問卷上。

犯罪觀念測量。採用「卑鄙的世界綜合症」指標中的三個有關觀念的問題，我

們要求受訪者按照 Likert 衡量標準將自己對兩地大眾的印象劃分為「值得信賴」、「公平」及「樂於助人」三類，在填答問卷的設計中，1 表示印象非常不好，而 5 則表示印象非常好。通過對兩年來所有調查樣本利用因素分析的轉軸法（Varimax）產生了兩個明顯分離的因素，即對本地（對居住區）及另一地（對另一社區）的「卑鄙的世界」看法。我們將這兩個因素分別作為反映對世界持普遍悲觀看法的重要共性的代表，並將其用作迴歸變項，即受訪者在這兩個因素上的得分越高，其「卑鄙的世界」看法就越嚴重。

分析的第二部分涉及對犯罪的恐懼。我們將對犯罪的恐懼分為在居住地及另一地走夜路這兩個層面。答案分為四類：「非常安全」、「比較安全」、「有些危險」以及「非常危險」。對犯罪行為的恐懼與其它兩組觀念變項存在著幾點不同之處：一、這是唯一一個被視為個人層面看法的變項。我們先前的研究指出，在因果方面，人們對犯罪的恐懼與對犯罪的評估有顯著不同（Chen & Guo, 1995）。二、對犯罪的恐懼變項中含有感情因素，這是其他變項中所不具備的。三、由於害怕而不敢走夜路有行為上的含意，因此對這個變項作出的預測與其他變項可能是不同的。

關於犯罪觀念的第三個部分是請受訪者估計在列出的七種暴力和非暴力罪行中，哪一種在本地和在對方城市發生的機率最高。這七種罪行分別是謀殺、強姦、搶劫、欺詐、賣淫、吸毒和貪污。其中，謀殺、強姦和搶劫和官方的定義一樣，被認為是暴力犯罪。

我們之所以將犯罪觀念分開在兩個層面上進行衡量，是為了證明觀念與地域鄰近性之間的關係。這個想法反映了涵化理論及非個人影響的理念，即個人距離被認識對象越遠，大眾傳媒的影響力就越大。因本地及另一地的地域不同而對觀念造成的影响可以借用「第三者效應」的比喻，稱之為「第三地效應」。也就是說，當被問及自己生活空間的安全問題時，人們更容易產生辯護心理，而對其它地方的危險性可能會不顧客觀事實地誇大其辭。這種自然傾向帶來了一個假說：如果評價對象是自己生活的地方時，人們對傳媒涵化的影響存在著天然的抵抗。與之相反，如果評價的對象不是本地的話，涵化的力量會增強。

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為了解受訪者的直接經驗，問卷中提出「你是否曾到過（另一地）？」這個問題，請其自己指出訪問另一地的頻率。答案分四類，從「從未去過」到「四次或以上」。對間接經驗的測量包括受訪者自認為對另一地的了解程度（不計信息來源）、與其他人討論另一地的頻率、及接觸媒體的習慣。通過

「你對另一地了解多少？」這個問題來測量受訪者自認為對另一地的了解程度。雖然了解的內涵為主觀判斷，但仍可借此釐清作出斷言的條理性。在人際交流方面，我們要求受訪者將自己與去過另一地的親朋好友談論那裡的頻率分為「從來不」到「經常」等四類。本研究中的「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不同於國外的「被害經驗」。我們採用了這樣的測量方法主要基於兩個考慮：1. 本研究的重點不但是香港和廣州兩地市民對本地，更是對對方社區認知和安全程度的估量。所以其「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重點不同於「被害經驗」；2. 如果詢問在對方社區的「被害經驗」，可能會因為人數太少，或完全沒有而不具有實際意義。因此我們的測量方法更加符合我們的研究目的。

有關接觸媒體習慣的測量，香港與廣州的問題略有出入但仍具可比性。我們紀錄香港居民一週中至少讀了一份報紙的天數以及觀看電視的總時間。另一個變項，「對渲染犯罪的媒體的依賴程度」，測量香港受眾是否將兩份或一份最煽情的大眾報紙納入「最主要的新聞來源」。我們向廣州居民問了同樣的關於看電視時間的問題，同時還問他們對香港電視「犯罪節目」感興趣的程度。因為他們接觸不到香港報紙，故此我們沒有問他們對香港報紙的信任程度這個問題。調查顯示，94% 的廣州居民經常收看香港電視，並將香港四個商業頻道中的至少一個列為自己最常看的頻道。

控制變項組。除了衡量受訪者的社會人口學特徵的四個通常的變項（年齡、性別、收入和教育程度）之外，我們還增加了在本地的「居住時間」，以排除另一種可能的解釋。由居住時間的長短可以看出對居住地感情的深淺，這對有關自己居住地的看法有正面影響，而對其它地方的看法則有負面影響。在所有的分析當中，這五個變項均作為第一組控制數據。為建立起同等可比性，我們做了平行並列的線性回歸，以此來檢驗經驗與形成對犯罪的看法的各種模式之間的關係。

陸、資料分析

一、客觀的犯罪紀錄統計資料和主觀的估量

從政府部門得到的統計數字顯示，從 1996 年到 1998 年，暴力犯罪和大多數其它類型刑事案件的數量呈逐漸下降的趨勢。把這些客觀數據和 1997 年至 1999 年之間受訪者對犯罪狀況的主觀估計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關係，或者說現實生活的安全與人們覺得治安環境惡化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將人們對居住地與其它

地方的同類犯罪所做的估計進行比較，還會發現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著差異，這其中存在著一種「第三地效應」。如果上述對現實的不同反應之間存在著某些聯繫，我們的調查資料就應有所顯示。

客觀的犯罪統計和變化。1996 年至 1998 年，廣州的各類犯罪案件數量都有所下降，其中詐騙案下降了 11.9%，賣淫案下降了 37.8%（見表 1）。由於無法掌握更詳細的各類犯罪案件下降的數字，我們只知道包括殺人、搶劫、強姦在內的暴力案件總共下降了 18%，涉及毒品的案件也一樣。在香港，除了強姦案上升了 4.5% 以外，其它各類犯罪案件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 9.9% 到 40%（涉及毒品案件）。雖然香港和廣州對犯罪有不同的界定標準，但兩城市的犯罪率都呈逐年下降的趨勢。

對自己所在城市犯罪狀況的主觀估計和變化。廣州和香港兩地的受訪者對各自所在城市犯罪狀況的評估結果顯示，人們認為搶劫的案發率是所有犯罪中最高的。為了和客觀統計數字作比較，我們把殺人、搶劫和強姦等暴力犯罪歸為謀殺/搶劫/強姦一類。在受訪者對兩個城市犯罪狀況的估計中，這類犯罪都幾乎占到全部犯罪的一半。實際上，在 1996 年，暴力犯罪分別只占香港全部犯罪的 19.2%（15191/79050）和廣州全部犯罪的 11.3%。兩個城市的受訪者都過度高估了暴力犯罪的比例。從 1999 年受訪者對犯罪狀況的估計結果看，盡管實際的犯罪率大幅下降，廣州居民仍覺得詐騙、搶劫和殺人案件在七類犯罪中有所上升，對其它四類犯罪的看法也大致相同。人們對於謀殺 / 搶劫 / 強姦這類犯罪的估計上升了 4.2%（3、7、9 列）。香港居民的調查結果基本上也相同，他們雖認為殺人、搶劫和強姦犯罪的總和下降了 4.9%，但卻覺得詐騙、搶劫和強姦案件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城市的受訪者都覺得各類犯罪的實際下降率遠遠低於官方統計數字所顯示的下降率。如果官方提供的統計數字與事實相符，為什麼客觀的犯罪數據和對犯罪狀況的估計之間會存在如此大的差異？我們認為，親身體驗並不是導致這種現象發生的唯一原因，應該還有其它方面的原因。

表 1：官方犯罪統計與受訪者對犯罪的估計之比較

廣州										
1996 犯罪統計			1997 犯罪估計 (%)		1998 犯罪統計			1999 犯罪估計 (%)		估計差 1999-1997 (%)
類型	數量	居住地	其他 社區	數量	%±1996	居住地	其他 社區	居住地	其他 社區	
詐騙	17300	6.1	5.9	15248	-11.9	6.6	9.6	0.5	3.7	
搶劫	*	38.9	40.3	*	*	41.9	44.9	3.0	4.6	
賣淫	5875	5.1	5.1	3650	-37.8	3.2	3.4	-1.9	-1.7	
強姦	*	0.6	1.3	*	*	0.3	2.0	-0.3	0.7	
腐敗	230	11.2	2.4	170	-26.0	11.0	5.7	-0.2	3.3	
販毒	508	3.0	19.9	415	-18.3	2.2	14.0	-1.1	-5.9	
謀殺	*	1.7	8.0	*	*	3.2	7.9	1.5	-0.1	
殺/搶/姦	7995	41.2	49.6	6556	-18.0	45.4	54.8	4.2	5.2	

香港										
1996 犯罪統計			1997 犯罪估計 (%)		1998 犯罪統計			1999 犯罪估計 (%)		估計差 1999-1997 (%)
類型	數量	居住地	其他 社區	數量	%±1996	居住地	其他 社區	居住地	其他 社區	
詐騙	--	16.8	13.3	--	--	23.4	10.9	6.6	-2.4	
搶劫	14432	29.4	30.5	12994	-10.0	29.9	32.9	0.5	2.4	
賣淫	--	5.1	8.3	--	--	4.1	9.4	-1.0	1.1	
強姦	86	5.3	0.4	90	+4.5	7.4	0.8	2.1	0.4	
腐敗	--	3.7	35.9	--	--	1.7	32.8	-2.0	-3.1	
販毒	4645	12.7	2.3	2778	-40.2	6.1	2.2	-6.6	-0.1	
謀殺	77	14.0	6.0	64	-16.9	6.5	4.3	-7.5	-1.7	
殺/搶/姦	14595	48.7	36.9	13148	-9.9	43.8	38.0	-4.9	1.1	

註：* 只有綜合數據

-- 無數據。

「第三地效應」。為了驗證確實存在「第三地效應」，也就是說，它影響我們對現實世界做出不客觀的、更加危險的斷言，我們列舉了對犯罪狀況估計的數據來進行兩種比較：1. 分別把兩地各自在不同時間的客觀統計數據與受訪者的估計進行內部比較，並尋找其中的固定變化；2. 把兩地在相同時間的數據進行對本社區與另一社區的犯罪估計對比，並尋找其中存在的差異（4、8、10 列）。自 1996 年

至 1998 年，廣州居民認為，香港的詐騙、搶劫和強姦案件有所上升，賣淫、腐敗、殺人和販毒案件則有輕微下降；香港居民認為，廣州的搶劫、賣淫和強姦案件有所增加，詐騙、腐敗、販毒和殺人案件則減少了。從第一個比較看，與客觀統計數字相比，兩地的受訪者都對當地犯罪狀況做了過高估計。從第二個比較看，人們對另一地犯罪狀況的估計與對當地犯罪狀況的估計存在明顯差異。例如，廣州居民對 1996 年和 1998 年廣州腐敗犯罪的估計分別是 11.2% 和 11.0%，而香港居民對廣州腐敗犯罪的估計分別是 35.9% 和 32.8%。在對大多數犯罪的估計結果中，都存在這樣的差別。至於人們是否會認為其它地方的治安環境更糟糕，這要取決於各類犯罪的性質而定。在 1996 年和 1998 年這兩年中，廣州居民都認為，香港的強姦、搶劫、販毒或殺人案件比廣州的案發率更高，但香港居民僅認為廣州的賣淫和腐敗犯罪比香港更多。從一定程度上看，我們觀察到的差距似乎可以為「第三地效應」提供證據。然而由於這個發現缺乏高度一致性及普遍性，任何結論性的判斷仍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二、內容分析

導致香港和廣州兩地居民過高估計犯罪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媒體對有關犯罪消息的大量報導。為了說明媒體與人們過高估計犯罪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證明，雖然政府部門的統計數字表明犯罪率在下降，但媒體有關犯罪的報導卻大大增加了。圖 1 和圖 2 以圖表的形式說明了兩地各自三家主要報紙對犯罪消息的報導次數。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兩個特點。第一，在這兩年中，我們所分析的三家香港報紙《東方日報》、《明報》和《南華早報》有關犯罪的報導次數一直高於內地的三份報紙。第二，這兩年的一月至二月，六份報紙有關犯罪的報導大體上都持上升趨勢。但其中也有例外，即香港的《明報》在 1997 年，以及廣州的《南方日報》在 1997 和 1999 年在犯罪方面的報導都有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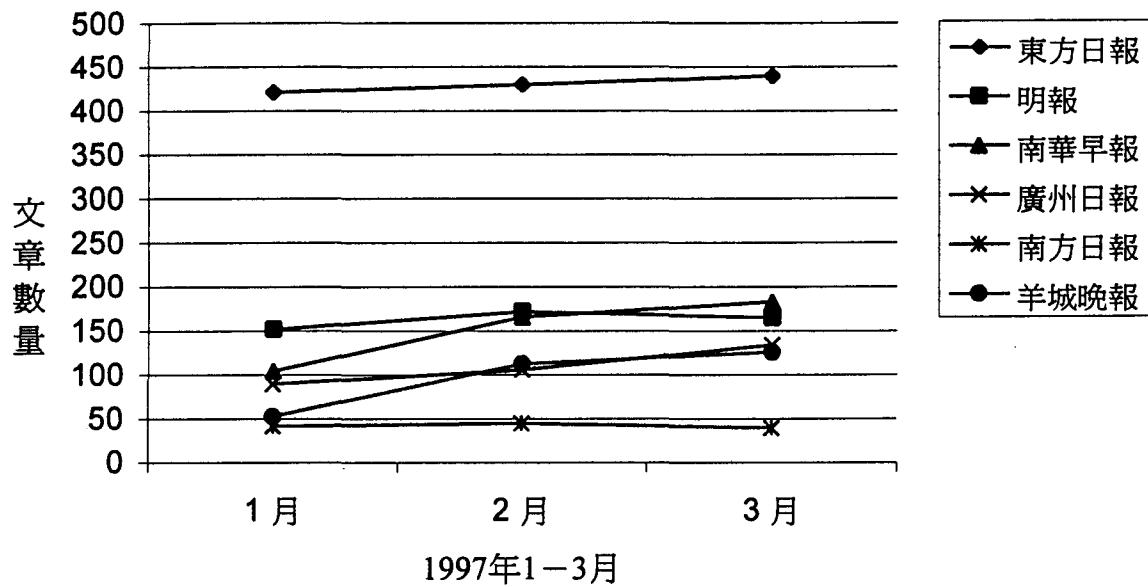


圖 1：內容分析：1997 年 1 月 – 3 月香港和廣州六家報紙有關犯罪的文章數量

註：廣州三家報紙 $N=982$ ；香港三家報紙 $N=2,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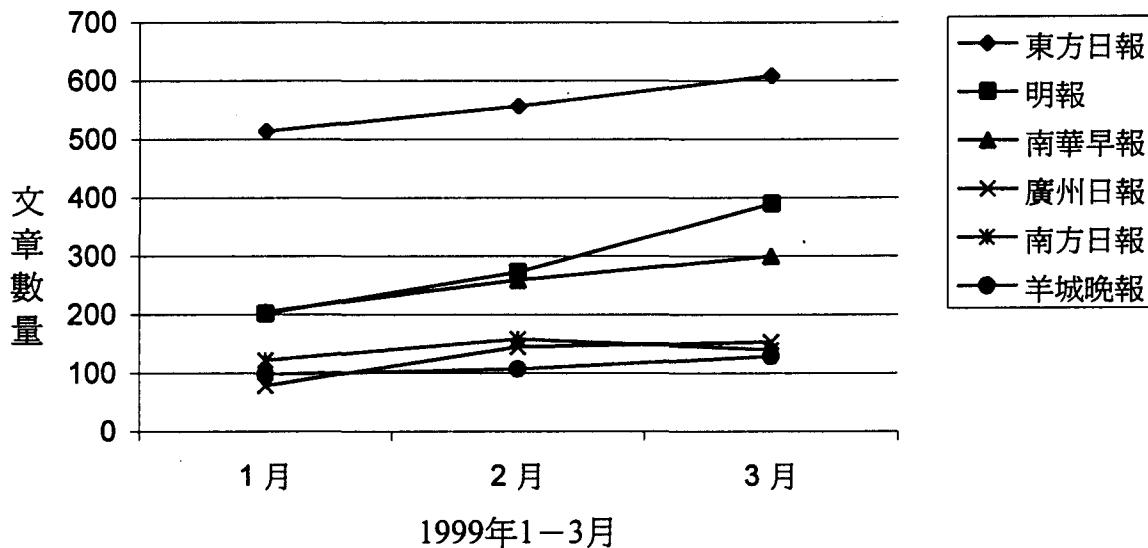


圖 2：內容分析 1999 年 1 月 – 3 月香港和廣州六家報紙有關犯罪的文章數量

註：廣州三家報紙 $N=1,002$ ；香港三家報紙 $N=3,660$

在表 2 中，為了了解媒體對犯罪的報導，我們來看一下四個特徵，即報導其它地方的犯罪案件的頻率、詳細描述犯罪內容、採用聳人聽聞的大標題，配有照片或圖表。比較這兩年的數據可以看出，香港媒體的犯罪報導在以下 4 個方面都有所上升：對其它地方的犯罪報導上升了 4%；在描述細節方面上升了 16%；標題的惹人注目程度上升了 7%；在配圖方面上升了 20%。廣州的媒體在犯罪消息報導方面則比較適度，在內容描寫和標題煽情等方面都只有很小的上升率，甚至在報導香港發生的犯罪案件和配圖方面還稍稍下降。把報導分析的結果和先前對犯罪狀況的估計相聯繫，似乎媒體對犯罪的報導和人們對犯罪狀況的估計之間存在著一致性。兩者好象都與客觀事實背道而馳。雖然我們進行調查的時間與官方做統計的時間不完全吻合，但分析結果確實顯示出媒體，特別是香港媒體，熱衷於犯罪報導的一個特徵，因為出版商認為有關犯罪的報導會吸引讀者。

表 2：內容分析：香港廣州六家報紙 1997 年和 1999 年犯罪報導特點

內容特點	香港報紙		廣州報紙	
	1997	1999	1997	1999
其它社區的犯罪報導頻率	16.0%	20.0%	1.0%	0.8%
描述是否詳細	52.0%	68.0%	20.0%	22.0%
標題是否戲劇化	33.0%	40.0%	22.0%	28.0%
是否附圖	51.0%	70.0%	0.5%	0.4%

三、抽樣調查分析

為了說明來自不同渠道的經驗對犯罪觀念的影響，我們必須首先理解來源與觀念這對關係的性質。先前的相關研究認為，大眾傳媒有能力塑造犯罪觀念（Sheley & Ashkins, 1981; Carpin & Keeter, 1992），這和涵化理論建議的影響力發生的方向相類似。我們的研究結合了非個人影響模式的觀點，將直接經驗視為獨立於傳媒使用之外的因素。同樣地，我們還將間接經驗分成兩個部分：其一是非正式的交流經驗，包括自我認為的對某地知識的瞭解程度，和是否和他人討論該地；其二是來自傳媒的經驗，包括讀報的日數，看電視的時間，對香港電視中犯罪新聞的興趣（只屬廣州受眾），以及對聳人聽聞的大眾報紙的依賴程度（只屬香港受眾）。這樣區分的主要目的是找出三種不同的信息渠道對觀念形成的各自的獨特作用。

「卑鄙的世界」觀念。在表 3 中，我們呈現了迴歸分析的結果。這個結果分析了來自不同渠道的經驗對涵化研究中的一組依變項「卑鄙的世界」的作用。正如早先提及的，為了簡化數據從總體上來理解消極悲觀的世界觀，我們使用了組合因素，而不是用單個的問題作為依變項。我們檢驗了不同類型的社會經驗對兩組依變項因素的作用，一組是有關本社區的信任感，公平，助人意願和對犯罪侵害的恐懼感的觀念；另一組是有關另一個社區的同樣這些觀念。

人口背景資料。因篇幅所限，有關人口背景變項對被訪者的觀念的影響並未展現在圖表中，在此作一個簡略的介紹。在樣本中，有三個人口學變項和依變項的觀念之間呈現比較一致的關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和「在本地居住的時間」。女性比男性對異地社區顯示出更強烈的「卑鄙的世界綜合症」，而在一個城市居住越久，對其他城市就越感覺到心理距離。人口學變項的影響有時也不一致，收入高的香港受訪者在兩年的調查中都對廣州人有較正面的評價，而廣州富裕的受訪者對香港人的影響卻相對負面。教育程度高的香港人對廣州人較少好感，而廣州的菁英們對香港人的印象卻較為正面。

直接經驗。分析顯示，在多數情況下，曾親身到訪另一個城市的人會對該地產生負面印象或是所謂的「卑鄙的世界綜合症」。1999 年的香港樣本是一個例外，不過未達顯著程度。從內容分析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似乎是類似傳媒信息產生的效果。對到過廣州的香港居民來說，那裡的政治控制和經濟發展差距可能令其不悅，但很難解釋為什麼香港之行給廣州的旅行者以負面印象。不過，考慮到我們調查中的具體問題（問對當地人的評價），可能的解釋是，無論回歸前後，訪港的廣州人都仍然感受當地人對大陸人的輕蔑態度。

間接經驗。人際談論和來自各種渠道的知識對觀念的影響可謂大相逕庭。對於某異地城市的知識與該對地市民的信任感，公平和助人態度的評價呈現強烈的正相關，基本上否定了「卑鄙的世界綜合症」之說。儘管這種關係在 1999 年的香港樣本中減弱了，但方向仍然是一致的。不出我們所料，儘管邊界兩邊的官方意識形態相左，人民之間關係依然密切。頗高的 betas 值（1997 年廣州樣本為 -.20, p < .001 ; 1999 年廣州樣本為 -.17, p < .001 ; 1997 年香港樣本是 -.18, p < .001 ）顯示知識的內容很可能是正面的。對異地的知識及瞭解程度顯然更容易使受訪者對該地居民產生正面的評價。另一方面，異地城市的是否成為人們的話題基本上和人們對該地居民的評價無關。唯一的例外是 1999 年的廣州樣本中，談論香港和兩地的「卑鄙的世界綜合症」之間呈現正面相關。

在 16 個和讀報和看電視有關的 beta 中，僅有三個在統計上顯著。其中兩個是讀報紙越多，對本地的評價越負面（1999 年的廣州和香港樣本）。由於當局對報紙內容的監察，以及防堵香港報刊入境，因此不難理解廣州受訪者的讀報習慣和所測量的觀念無關。另一方面，在兩年的香港樣本中傳媒使用對依變項缺乏解釋效力，可以歸咎於一般的媒介使用頻率對犯罪觀念不起作用。

分析廣州市民對具體傳媒內容的接觸，可以發現明顯不同的效果結構。廣州受眾對香港電視中犯罪新聞的關注程度，和他們對香港的「卑鄙的世界綜合症」指標顯著正面相關（在 1997 年， $\text{beta}=.13, p<.01$ ；在 1999 年， $\text{beta}=.20, p<.001$ ）。在 1999 年的調查中，不但顯著程度更高了，而且收視香港電視中的暴力節目所構建現實觀念還移植到對自己社區的認知，儘管顯著程度是前者的一半。在香港的樣本中，對受眾所接觸的傳媒性質的測量也發現了類似的趨勢。如果香港受訪者的信息需求依賴於本地某份煽情的大眾報紙，他們往往更傾向於對香港和廣州都持負面的觀念。

恐懼犯罪侵害。表 4 分析了對個人層面的觀念，即犯罪侵害恐懼，以及影響它們的因素。五個人口學控制變項有其共性（未在圖表中列出）。被訪者中的女性，年長者和富裕者都比其他人更害怕夜行，尤其是在異地。香港居民更是如此。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和在本地生活時間久的香港人恐懼心較輕，而同樣的群體在廣州卻更脆弱。

直接經驗。除了 1997 年的香港調查之外，其他三個樣本都顯示受訪者對異地的親身訪問的經歷會減輕對他們在該地行夜路的恐懼。不過，這種旅行經歷對在本地的夜行的擔心卻無影響。這是一個跨越地域和時間的發現。

間接經驗。無論廣州還是香港，對異地的知識程度的自我估量和對在異地遭受侵害的恐懼都成反比，但和在本地受害的擔憂無關。自我感覺對異地的瞭解和「無畏精神」高度相關。（廣州樣本，1997 年為 $-.13, p < .001$ ，1998 年為 $-.11, p < .01$ ；香港樣本，1997 年為 $-.18, p < .001$ ，1998 年為 $-.11, p < .01$ ）。然而，對外地城市談論的多寡卻和對該地治安狀況擔憂成反比，這個趨勢遍及兩年中的全部調查樣本。並且，似乎談論外地越多，對在本地受害的恐懼也隨之增加。

表 3：抽樣調查 Standard OLS 回歸分析：「卑鄙的世界」觀念的原因之跨時間跨地區分析

	廣州 1997		香港 1997		廣州 1999		香港 1999	
	對居住區	對另一社區	對居住區	對另一社區	對居住區	對另一社區	對居住區	對另一社區
人口學指標 R ² (%)	1.70**	4.50**	2.40*	4.90**	1.70*	0.70	1.40#	3.00**
直接經驗 訪問過另一社區	.03	.09*	-.06	.10*	-.02	.07#	.07#	.06
Incr. R ² (%)	0.30	1.80*	1.30*	1.40*	0.20	0.10	0.50#	0.10
間接經驗 對另一社區知識	.05	-.20***	.06	-.18***	.09*	-.17***	.02	.01
討論過另一社區	-.03	-.04	-.03	.02	.07#	.12**	.01	.01
Incr. R ² (%)	0.20	6.00***	0.50	4.80***	1.90**	3.80***	0.20	0.00
讀報頻率	-.01	.03	.07	.01	.07#	-.02	.09*	-.04
看電視頻率	-.10*	-.06	-.05	-.07	-.01	-.03	-.04	.02
對香港電視犯罪專題的關注	.07#	.13**	--	--	.11**	.20***	--	--
對香港傳媒犯罪報導的依賴	--	--	.10#	.17***	--	--	.12**	.18***
Incr. R ² (%)	1.80*	2.10**	1.70*	2.90***	1.60*	5.00***	1.90**	5.10***
Total R ² (%)	4.00	14.40	5.90	14.00	5.40	9.60	4.00	8.20

註：「卑鄙的世界」觀念分為「對居住地」及「對另一社區」兩個因素；「訪問過另一社區」是連續變項，由「從未」到「四次以上」；「對另一社區知識」為受訪者自己指出的主觀了解；「討論過另一社區」是連續變項，由「從來不」到「經常」；「媒體接觸頻率」紀錄了受訪者每星期讀報的天數及每天看電視的小時數。「依賴」是用主要新聞來源測量的。

表中數字為標準回歸系數。廣州 1997 N=968 1999 N=593. 香港 1997 N=572 1999 N=655 #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4：抽樣調查 Standard OLS 回歸分析：犯罪恐懼感的原因之跨時間跨地區分析

	廣州 1997		香港 1997		廣州 1999		香港 1999	
	行夜路 (居住區)	行夜路 (另一社區)	行夜路 (居住區)	行夜路 (另一社區)	行夜路 (居住區)	行夜路 (另一社區)	行夜路 (居住區)	行夜路 (另一社區)
人口學指標 R ² (%)	6.70***	2.50**	2.40*	5.20***	4.60***	2.80**	2.10**	3.70***
直接經驗 訪問過另一社區	-.00	-.15***	-.01	-.02	0.2	-.11**	-.05	-.14***
Incr. R ² (%)	0.00	1.60***	0.10	0.10	0.00	1.10**	0.30	2.00***
間接經驗 對另一社區知識	-.08	-.13***	-.10*	-.18***	-.9#	-.15***	-.02	-.11**
討論過另一社區	-.05	.09#	-.02	.11*	.05	.11**	.02	.09#
Incr. R ² (%)	0.70	1.80***	1.00*	3.00***	0.80#	1.80***	0.00	2.50**
讀報頻率	-.03	.06	.05	.11*	-.02	-.02	-.02	-.04
看電視頻率	-.01	.05	-.02	.05	.03	.04	.03	-.01
對香港電視犯罪專題的關注	.05	.15***	--	--	.04	.08#	--	--
對香港傳媒犯罪報導的依賴	--	--	.12**	.16***	--	--	.08#	.10*
Incr. R ² (%)	0.05	2.20***	2.40**	3.90***	0.20	0.10	0.90#	1.00*
Total R ² (%)	7.45	8.10	5.90	12.20	5.60	5.80	3.30	9.20

註：「行夜路」變項用「非常危險」到「非常安全」四個等級測量犯罪恐懼感。

表中數字為標準回歸系數。廣州 1997 N=968 1999 N=593. 香港 1997 N=572 1999 N=655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在傳媒使用變項方面，無論是閱報日數還是電視收視時間基本上都和恐懼犯罪無關。僅有的例外是 1997 年的香港樣本中，閱報多者對在廣州夜行較感恐懼。一般的傳媒使用頻率或時間看來很難有效測試涵化理論或非個人影響模式。不過，圖表顯示關注具體傳媒內容的變項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類似於「卑鄙的世界綜合症」例子，廣州居民對香港電視中犯罪內容的關注，與他們對於在香港受犯罪侵害的恐懼程度成正比，兩年都是如此 ($15, p < .001$ and $.08, p < .10$)。在香港樣本中，對本地煽情報紙的依賴程度越高，就越是害怕在本地，甚至在廣州走夜路。由於本圖表中涉及的電視報紙都是香港的，顯而易見，對某個城市的犯罪現象的報導只能影響對在該城市受到犯罪侵害的恐懼。對廣州居民的調查結果就反映了這一點。而香港受眾對在廣州夜行的恐懼，則很可能是因為香港煽情報紙對廣東地區的犯罪案同樣以聳人聽聞的方式，日復一日地報導。

柒、結論與討論

本文研究了形成人們對犯罪看法的三種因素，即直接經驗、日常交流與大眾傳媒的不同作用。通過整合非個人交往影響模式及涵化理論，我們可以看到，對事物的看法不僅明顯分為個人和社會層面，而且每個層面都有其獨特的影響途徑。我們認為人們對自己的居住地和其它地方的犯罪看法是由三個主要部分構成的：1、對犯罪事件有理性的、社會層面的估計；2、普遍存在著的「卑鄙的世界」觀念；3、個人層面對犯罪恐懼感。接下來，我們檢驗了直接經驗、非正式和正式傳播三種信息來源，以此來釐清其對距離遠近不同的認識對象的不同影響。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媒體在人們對社會層面的犯罪看法中所起的作用，比其在個人層面對犯罪的恐懼中的作用還要大。我們還選擇了廣州和香港作為調查對象，這是因為由於各種自然的原因，兩地居民的直接與間接經驗的交流特別繁忙。

我們從中發現了什麼結論呢？首先，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官方犯罪統計數字所代表的客觀現實與人們對犯罪的估計幾乎是毫不相關的。儘管 1996 年和 1998 年廣州和香港兩地的各類犯罪都顯著減少，然而兩地的居民仍然傾向於相信他們生活環境中的犯罪活動增加，特別是暴力犯罪增多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受訪者的親身經驗和間接得到的認識，另外人們也傾向於認為官方的統計數字很可能是不準確的。為了對這種現象做出解釋，就需要把個人的犯罪恐懼經驗及其影響都考慮在內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與客觀現實的趨勢相反，我們發現大眾傳媒在這幾年

中有關犯罪方面的報導大大增加了，其中包括犯罪消息數量的增加、更多地報導暴力犯罪以及更詳細地描述犯罪內容。雖然中國內地的媒體報導通常會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督，但近年來由於受到商業化潮流的影響和市場經濟的壓力，內地的媒體也不得不探索取悅讀者的方法，而刊登犯罪報導就是吸引讀者的方法之一。香港媒體有關犯罪的報導量則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這就導致了受訪者對犯罪狀況的過高估計，助長他們對其它地方抱有「卑鄙的世界」觀念，同時也加深了人們對犯罪的恐懼。客觀現實、媒體報導以及公眾對犯罪的看法，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與 Funkhouser (1973) 有關媒體製造議題的研究發現極為相似。分析三者的關係應是未來研究的課題之一。

第二，按照非個人交往影響的假定，就罪惡世界觀來說，人們在形成對居住地的看法時，受媒體的影響較小，而在評判異地時，媒體的影響會比較大，且距離越遠，影響越大。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關係也存在於對犯罪的恐懼感上。就我們的研究而言，社會與個人層面上的差別並沒有像我們預期的那麼明顯。而具體的媒體或媒體內容的使用所產生的效果大於泛泛的對媒體使用的測量，這一點再次說明了具體的效果只能從具體的測量中找出。我們的「第三地效應」假說未能得到充分的數據支持。問題可能出在測量上，亦不排除對理論基礎進行調整的必要。這將是我們以後的另一個主要研究內容。

第三，如果媒體對另一地進行大量的負面報導，人們就會對這個地方產生不良印象。而如果人們親身接觸另一地，也很容易對其產生不良印象。這是一個有趣但並不令人驚訝的發現，而且可能並不局限於對犯罪的認識。到過內地的香港人總是對內地人沒有禮貌、缺乏秩序、官僚作風和目無法紀的普遍現象感到失望。而到香港旅遊的內地人也經常會抱怨香港人的傲慢、雙重標準和商業價值觀。如果的確遇到了上述的情形，那麼個人的直接經驗與媒體現實就不謀而合了。當大眾傳媒的信息符合人的感覺時，這種直接體驗的作用就變得尤其重要。像「曾到過香港」和「害怕在香港走夜路」之間的反比關係證明，很可能是由於直接經驗使得到過香港的廣州人，認為香港電視中充斥著的暴力行為與香港的現實並不符合。

第四，和直接經驗不同，人們的日常交流似乎更著重於談論其它地方的不良現象，這就容易讓人對另一地做出不好的評價，也易於加深人們對那裡的犯罪活動的誇大了的恐懼感。通常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對人們看法的形成造成的影響與媒體的報導傾向是一致的，這就說明媒體可能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中發揮一定的刺激作用。

通過研究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在人們形成對犯罪的觀念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證明了我們有關人們對犯罪觀念形成的原因及其影響的論斷。而且，內容分析和調查研究似乎都表明「第三地效應」在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儘管我們數據的說服性有限。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在哪種特定環境下更容易產生這種效應。看來人們在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和其它地方時，除了依靠自身的生活經驗，對媒體的不可避免的依賴更增加了媒體的潛在危害性。通過這項研究得到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即使媒體的報導與客觀事實不符，甚至觀眾或讀者本人曾有過與媒體報導相反的親身體驗，媒體對人們觀念的形成仍有極大的影響。我們說媒體對人們認識現實有不良的影響，是提醒大家注意，與現實生活中的安全環境相比，媒體報導的血腥文章與人們對犯罪的看法之間有著更加密切的關係。

參考書目

- Carpini, M., & Keeter, S. (1992). The public's knowledge of politics. In D. Kennamer (Ed.), *Public opinion, the press, and public policy* (pp. 38-59). Westport: Praeger.
- Chen, H., & Guo, Z. (June 1995). Mean but not scary world: A two-level view of the cultivation eff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lbuquerque.
- Chen, L. (1991). Cultivation research: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elevision on children. Thesis.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u, S. (1993). Sex role stereotypes in televised cartoons in Hong Kong. Thesis.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ronbach, L. J. (1951).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 *Psychometrika*, 16, 297-334.
- Doob, A., & Macdonald, G. (1979). Television viewing and fear of victimization: Is the relationship caus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70-179.
- Einsiedel, E., Salomone, K., & Schneider, F. (1984). Crime: Effects of media exposur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n issue salience. *Journalism Quarterly*, 61, 131-136.
- Funkhouser, G. R. (1973). The issues of the sixt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7, 62-75.
- Gerbner, G., Gross, L., Morgan, M., & Signorielli, N. (1980). The "mainstreaming" of

- America: violence profile No. 11.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 10-29.
- Gerbner, G., Gross, L., Morgan, M., & Signorielli, N. (1994). 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 The cultivation perspective. In J. Bryant & Jennings and D. Zillman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p. 17-41). New Jersey: Erlbaum.
- Graber, D. (1980). *Crime news and the public*. New York: Praeger.
- Guo, Z. (2000). Media use habits, audience expectations and media effects in Hong Kong's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Gazette*, 62, 133-151.
- Glynn, C., Ostman, R., & McDonald, D. (1995). Opinions, perception, and social reality. In T. Glasser & C. Salmon (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pp. 249-277). New York: Guilford.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 Jeffres, L., Atkin, D., & Neudendorf, K. (Nov. 1998). Media mainstreaming and public opinion: Pulling the public toward the no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idwest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hicago.
- McLeod, J., Scheufele, D., Moy, P., Horowitz, E., Holbert, R., Zhang, W., & Hicks, J. (Aug. 1998). Understanding deliberation: The effects of discussion networks on participation in a public foru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Baltimore, MD.
- Morgan, M., & Shanahan, J.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meta-analysi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1-45.
- Mutz, D. (1992). Mass media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483-508.
- Mutz, D. (1998). *Impersonal influence: How perceptions of mass collectives affect political attitu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Patterson, T. (1993). *Out of order: How the decline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news media undermine the American way of electing presidents*. New York: Knopf.
- Peters, J. (1995). Historical tensions in the concept of public opinion, In T. Glasser, & C. Salmon (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pp. 3-32). New York: Guilford.
- Popkin, S. (1991). *The reasoning voter: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tter, J. (1994). Cultiv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Journalism*

Monographs, 147, 1-35.

Sheley, J., & Ashkins C. (1981). Crime, crime news, and crime view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 492-506.

Sherif, M. (1967). *Social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products*. Chicago: Aldine.

Tyler, T. (1980). Impact of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experienced events: The origins of crime-related judgments and behavi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 13-28.

Tyler, T. (1984). Assessing the risk of crime victim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personal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 and socially transmitte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0*, 27-38.

Tyler, T., & Cook, F. (1984). The mass media and judgments of risk: Distinguishing impact on personal and societal level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693-708.

Comparing Direct and Mediated Experience as Sources of Crime Perception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Zhongshi Guo · Jianhua Zhu ·
Huailin Chen · Xu Yu · Yu Huang*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cultivation and impersonal impact approaches, this research assessed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direct experi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use habits on crime perceptions by people from two communities,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ity of Guangzhou. Data from newspaper content, parallel surveys, and official statistics were obtained in both communities in 1997 and 1999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three perception sources on: estimates of crime rates, mean world judgments, and fear of crime. Within and cross-community comparisons closely connected individuals' heightened crime

* Dr. Zhongshi Gu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r. Jianhua Zhu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Huailin Che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cao University; Dr. Xu Y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r. Yu Hu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erceptions with media's sensational crime coverage. Direct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other community tended to contradict the media world, although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s appeared to compliment media portrayals. Findings showed some supportive evidence for the prediction that cultivation and impersonal impact would become strengthened when the object of evaluation was removed from one's own community. This "other-community effect" tended to be reinforced by inform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ultivation effect, impersonal influence, crime coverage, crime perception, third neighborhood effect, media effects